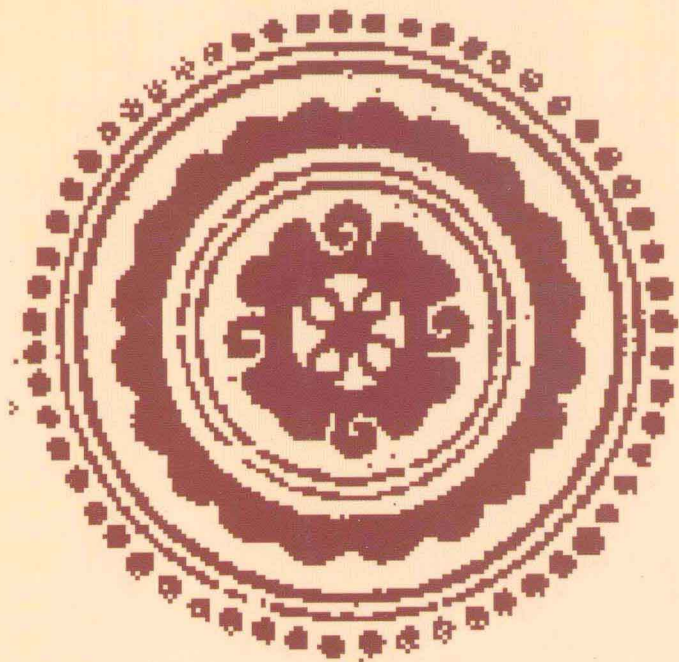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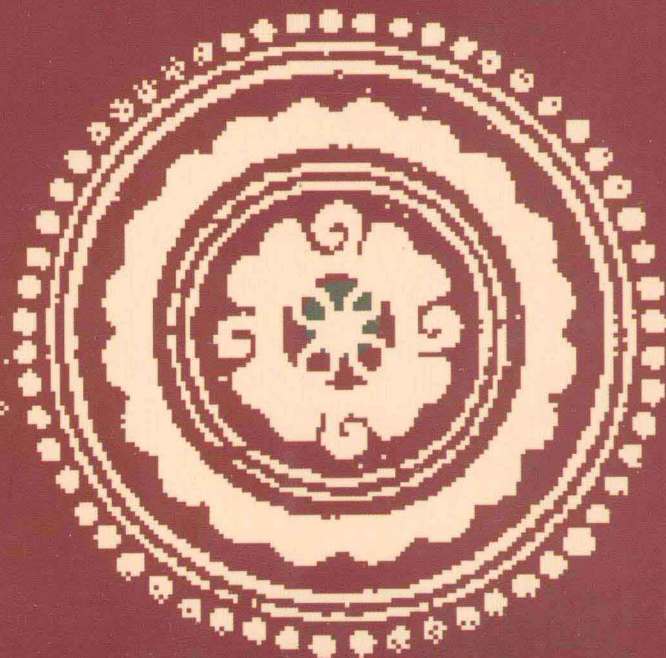




西北民族论丛

● 周伟洲 主编 ● 第九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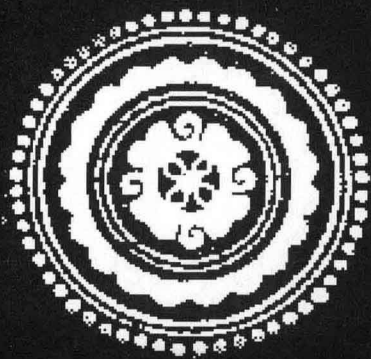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北民族论丛

● 周伟洲 主编 ● 第九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北民族论丛. 第九辑 / 周伟洲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7-5161-3619-5

I. ①西… II. ①周… III. ①民族历史—西北地区—文集 IV. ①K28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7120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顾世宝
责任校对 徐 楠
责任印制 张汉林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4.25
插 页 2
字 数 393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西北民族论丛》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周伟洲

成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志勇 王 欣 尹伟先 厉 声

吕建福 余太山 杨圣敏 张 云

李大龙 李范文 李 琪 罗 丰

苗普生 周伟洲 高永久 樊明方

主办单位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

前 言

《西北民族论丛》由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主办，每年出版一辑。《论丛》是以“西北民族”为研究对象，重点是西北民族史与民族关系史、西北民族与邻国交流史、西北民族宗教文化研究、西北民族地区自然环境与社会发展研究等。从学科来讲，西北民族研究不仅涉及历史学中的民族史、中外关系史、历史地理、历史文献学、科技史、文物考古等分支学科，而且涉及民族学、社会学、地理学、法学、经济学等人文社会大学科。因此，西北民族研究虽然仅是对西北地域的各个民族历史与现状的研究，包含的内容却非常丰富。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在西部大开发的新形势下，尤为重大。

《论丛》面向国内外，广泛征集有关西北民族研究的论文和民族调查报告、译文、书评等，以期尽量展示有关西北民族的高水平研究成果。《论丛》还收录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举办的面向国内外的“马长寿民族学讲座”论文。

《论丛》采取匿名审稿制度，以创新性和学术水平作为择稿的主要标准，不囿于一家之言，提倡平等争鸣，以期不断提高学术水平，推动西北民族研究的创新和发展。

总之，《论丛》的宗旨是：繁荣学术、服务现实，形式多样、不断创新。我们期待国内外广大学者、读者关心和支持《论丛》，不断惠赐佳作，帮助我们办好，使之能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在西部大开发的实践中，作出自己的贡献。

最后，感谢陕西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及所有支持《论丛》出版的单位和个人，没有你们无私的帮助，《论丛》是很难如期出版的。

周伟洲

2002年2月

《西北民族论丛》第九辑简介

本辑刊自第八辑正式列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从第九辑起,将增加篇幅,以及中英文提要、关键词;提高办刊水平,为“繁荣学术,服务现实,形式多样,不断创新”而努力。第九辑共收辑论文22篇、译文1篇。按时代和内容可分为五部分。

1. 中国古代民族历史与文化,有论文8篇:《两汉时期中亚人的东来及活动》、《〈汉书·地理志〉所载郡都尉数考辨》、《王、天王、皇帝——十六国时期各政权首领名号研究》、《北朝隋唐鲜卑豆卢氏、源氏家族比较研究》、《唐代羁縻府州辑补》、《薛仁贵“三箭定天山”事迹考——兼论7世纪中叶唐与铁勒之关系》、《八思巴对中国文化的贡献》、《锁子甲传入中国考》。每篇多有新意。

2. 清、民国时期藏族社会文化与新疆、陕西民族关系等问题,有论文5篇:《清代川康藏区土司建制及其社会组织》、《清乾嘉时期新疆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研究》、《国民政府时期沈宗瀚与藏民子弟学校的筹备》、《陕西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族关系》、《历史时期印度、尼泊尔在藏特权及其被废除探析》。

3. 西北回族宗教文化方面,有论文3篇:《早期苏菲主义者史补理小考》、《中国的宗教皈依:对穆斯林与基督徒皈依原因的初步比较》、《近代西安清真餐饮业文化机制探索》。

4. 西北民族人类学、民族学考察方面,有论文3篇:《民族文化的在地特色——湖南维吾尔族宗教信仰的人类学考察》、《自我与他者:河南蒙古族文化建构视野下的民族认同差异》、《地方化与去地方化:西北回族三

镇调查》。

5. 马长寿学术史及研究评述，有论文 2 篇：《马长寿先生与中央博物院（上）》、《略论马长寿先生的北魏史研究——以〈乌桓与鲜卑〉为中心》。前文系作者在收集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档案基础上撰成。

此外，还有译文 1 篇，即《花刺子模（Khwārizm）历史地理考察》。

本刊启事

一、本刊已列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2012—2013),欢迎国内外学者赐稿。来稿请以电子版及纸本形式寄至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西北民族论丛》编辑部(地址: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邮编:710062;E-mail:weizhou@snnu.edu.cn)。

二、来稿请附中英文提要、关键词。来稿一般不退稿,三个月内通知审稿结果,决定是否刊用,请勿一稿多投。

三、本刊实行匿名审稿制,来稿请另写明作者姓名、单位、职称及通信地址、联系电话、电子邮箱。

四、本刊已被《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及CNKI系列数据库收录,凡投本刊的论文,视为其作者已默许收入上述数据库。

五、凡在本刊发表之论文,本刊将酌付稿酬并奉赠刊物2本,数据库电子版稿酬亦包含其中。

《西北民族论丛》编辑部

2012年10月

目 录

两汉时期中亚人的东来及活动	韩 香 (1)
《汉书·地理志》所载郡都尉数考辨	景凯旋 (24)
王、天王、皇帝	
——十六国时期各政权首领名号研究	吴洪琳 (35)
北朝隋唐鲜卑豆卢氏、源氏家族比较研究	高 然 (54)
唐代羁縻府州辑补	王义康 (76)
薛仁贵“三箭定天山”事迹考	
——兼论 7 世纪中叶唐与铁勒之关系	任宝磊 (97)
八思巴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王启龙 (114)
锁子甲传入中国考	马 冬 (144)
清代川康藏区土司建制及其社会组织	周伟洲 (159)
清朝乾嘉时期新疆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研究	赵海霞 王曙明 (187)
国民政府时期沈宗濂与藏民子弟学校的筹备	徐百永 (204)
陕西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族关系	王爱云 (215)
历史时期印度、尼泊尔在藏特权及其被废除探析	梁俊艳 (225)
早期苏菲主义者史补理小考	哈宝玉 (244)
中国的宗教皈依:对穆斯林与基督徒皈依原因的初步 比较	马 强 (253)

近代西安清真餐饮业文化机制探索	蔡宇安 (271)
民族文化的在地特色	
——湖南维吾尔族宗教信仰的人类学考察	佟春霞 杨圣敏 (287)
自我与他者:河南蒙古族文化建构视野下的民族	
认同差异	萨仁娜 (298)
地方化与去地方化:西北回族三镇调查	刘玉彪 马红梅 (312)
马长寿先生与中央博物院(上)	王 欣 (322)
略论马长寿先生的北魏史研究	
——以《乌桓与鲜卑》为中心	尹波涛 (337)
花刺子模(Khwārizm)历史地理考察	
.....	斯特朗格(Guy le Strange)著 韩中义 朱亮译 (351)
Abstracts and Key Words	(364)

两汉时期中亚人的东来及活动*

韩 香

提 要：自西汉张骞凿空西域，中原与中亚官方的正式交往开始了。随着双方交往的日益密切，两汉时期大量的中亚诸国人来到中国，他们中间既有来华的质子、贡使及官员，也有不少的中亚贾胡、艺人及传教僧。这些人的到来不但为汉文化增添了新的血液，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西交通与交流的发展。

关键词：中亚人 两汉 活动

中原与中亚^①西域的民间交往及物质文明的交流，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就开始了。殷墟妇好墓出土大量商代和阗玉石^②，中亚阿尔泰巴泽雷克(Pazyryk)大墓发现的公元前5—前4世纪的中国铜镜和丝织品^③，以及张骞在大夏时所看到的出产于蜀地的竹杖^④，都表明中原与西方的民间商业活动远远早于张骞出使西域。但自张骞凿空西域之后，中原与中亚官方的正式交往才开始，随着双方交往的日益密切，两汉时期大量的中亚人来

* 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汉迄五代中亚胡人来华及活动研究”（项目批准号：06CMZ004）资助。

① 这里所说的中亚是指葱岭以西，包括波斯地区，一般所谓狭义的“西域”（今新疆地区），不包括在内。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殷墟玉器》，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11页。

③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19页。

④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66页。《汉书》卷六一《张骞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689页。

到中国，开启了中西交流史新的一页。

一 汉和葱岭以西各国的交往

汉和葱岭以西的正式交往当始自张骞之“凿空”。所谓“凿空”，司马贞《史记索隐》注云：“谓西域险扼，本无道路，今凿空而通之也。”^①可见张骞出使西域是中西交通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战国后期至汉初，匈奴日益强大，“东败东胡，西破月氏，南逼河套”，从而称雄漠北。汉初六十年国力尚未恢复，对匈奴只能采取妥协政策，与匈奴和亲，并且每年向匈奴赠送大批缯絮财物，但匈奴仍不时侵扰汉边，掳掠汉朝的边民及财富。汉武帝刘彻（前140—前87在位）即位后，开始发动对匈奴的反击。武帝建元三年（前138），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目的是联络被匈奴人从河西赶走而定居在阿姆河一带的大月氏，与汉联合共击匈奴。张骞一行一百多人出陇西赴大月氏，经过匈奴控制的河西地区时被匈奴所获，被扣11年，后乘机逃脱，辗转到了大宛，后经康居，抵达大月氏。《史记·大宛列传》载张骞经宛都，宛王“为发导译，抵康居，康居传至大月氏”^②。当时大月氏已立新王，吞并了大夏，安居乐业，加上距中原太远，无意进攻匈奴。张骞不得要领，于武帝元朔三年（前126）返回长安。张骞虽然没有搬来大月氏的兵，却全面了解了西域的政治和地理情况。

元狩四年（前119）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这次欲联络居于伊犁河流域的乌孙，招引其返河西故地，以“断匈奴右臂”。这一次的使团有三百多人，“多持节副使”，至乌孙，因乌孙畏惧匈奴，且离汉远，不知汉之虚实，“王不能专制”，不愿远徙。张骞于是分遣副使往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及旁诸国，张骞归国，乌孙“发导译送骞还”，又遣数十人随张骞使汉，“因令窥汉，知其广大”^③。而张骞所派副使回国时

^①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注引司马贞《索隐》，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70页。

^② 同上书，第3158页。

^③ 同上书，第3169页。

也带回了许多所到国的使者。

张骞西行，不仅达到了“断匈奴右臂”的目的，而且开通了与西域的丝绸之路，使得汉和中亚、西亚、南亚诸王国之间建立了直接的政治与贸易往来关系，“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①。此后随着李广利伐大宛，取天马，以及宣帝神爵二年（前60）汉设立西域都护府，控制了塔里木盆地，汉与西方的联系更加密切。“西北外国使，更来更去”，汉朝则西去“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人，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②。汉和西域的交往达到了一个高潮，这和张骞的开拓之功是不能分开的。

当时汉和中亚各国的交通是从长安经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安西到敦煌，敦煌郡龙勒县有玉门、阳关，由此西行有南北二道。《汉书·西域志》载：“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处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③

随着中西交通的畅通，汉和葱岭以西国家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和汉发生交往的国家有大宛、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条支、身毒、犁轩（大秦）等。

大宛：《史记·大宛列传》载：“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善市贾，争分铢。”可知自大宛以西人种文化上大同小异。汉和葱岭以西交往，最直接的就是大宛。大宛地处中西交通要道，“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扞弥、于阗”，是中亚的一个大国，其地即今中亚费尔干纳一带。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经过大宛，得到大宛王的帮助，至大月氏。张骞第二次出使乌孙时，也曾派副使到大宛。大宛民以农业定居为主，兼从事畜牧业，“其地有蒲陶（葡萄）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子马也”。汉时从

① 《汉书》卷六一《张骞传》，第2693页。

②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173、3170页。

③ 《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第3872页。

大宛归国时，带回许多农作物种子，在中原培植，著名的如葡萄、苜蓿等^①。

汉武帝闻大宛产名马汗血马，号为“天马”，“使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大宛因汉绝远，不予，并攻杀汉使，取其财物，于是汉武帝兴兵伐大宛。经过几年艰苦卓绝的征战，汉军尽管损失严重，但于武帝太初四年（前101）最终获胜，得到大宛良马，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牝牡三千余匹”，并与之结盟而去。大宛之战，大大提高了汉朝的威信，“诸所过小国闻宛破，皆使其子弟从军入献，见天子，因以为质焉”^②。班固亦云：“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③ 东汉时期大宛除一度依附莎车外，一直与汉保持着友好往来及通商关系，直到西晋仍向朝廷献汗血马。

大宛有时又作渠搜。《拾遗记》载元狩六年（前117），“渠搜国献网衣一裘。帝焚于九达之道，恐后人征求，以物奢费，烧之，烟如金石之气”^④。有学者认为此渠搜即大宛^⑤。

康居、奄蔡：康居“与大宛邻国”，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经过大宛，大宛王发导译将其送至康居，由康居再至大月氏。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至乌孙时，也曾派副使出使康居。此后康居和汉建立了经常的往来。康居为中亚大国，“有户十二万，口六十万，胜兵十二万人”^⑥，汉代康居已由锡尔河以北的游牧地区扩展到锡尔河以南即索格底亚那地方。也即汉魏以后的粟弋、粟特国^⑦。

《汉书·西域传》：“成帝时，康居遣子侍汉，贡献。然自以绝远，独

①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载：“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第3173页。

②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178页。

③ 《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第3873页。

④ （晋）王嘉撰，（梁）萧绮录，齐治平校注：《拾遗记》卷五，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3页。

⑤ 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册，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292页。

⑥ 《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第3892页。

⑦ 白鸟库吉：《康居粟特考》，傅勤家译，文史小丛书，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3页。

骄慢，不肯与诸国相望。”^① 康居始终轻侮汉使，西域都护派员到康居，其席位在乌孙使者之下，都护郭舜建议和康居断交，然汉廷出于通贡、重致远人的考虑，接受了康居侍子，此后康居“终羁縻而未绝”。

《梁书·康绚传》亦载：“初汉置都护，尽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待于河西，因留为黔首，其后即以康为姓。”^② 康绚即康居侍子的后代。

东汉和帝永元元年（89），窦宪击败北匈奴，永元三年（91），复置西域都护，以班超为都护，进一步加强了西域同中原之间的联系。康居大约在这时期又开始和汉保持官方联系。章帝建初三年（78），班超曾率疏勒、康居、于阗、拘弥兵攻姑墨城，班超为此上书：“今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康居复愿归附。”^③

奄蔡国在康居西北，东汉时称阿兰、聊国，属康居，与康居同俗。汉丝绸之路北道西逾葱岭则可至康居、奄蔡。

大月氏：大月氏在汉代又称大夏。月支本是活动在中国河西“敦煌祁连间”的一个部落，后为匈奴所迫，迁至塞地。公元前130年左右，大月氏为乌孙所破，从塞地西徙，占据了阿姆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并征服了吐火罗人所建大夏王国，“遂迁于大夏，分其国为休密、双靡、贵霜、盼顿、都密，凡五部翕侯”。大夏故地就成为大月氏的国土。故汉代亦称之为大夏。至公元1世纪最终建立了以大月氏为首的贵霜政权，“后百余岁，贵霜翕侯丘就却攻灭四翕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④，将领土扩展到了兴都库什山脉以南。至贵霜王迦腻色迦在位时期（Kanishka，约100—126在位），贵霜帝国达到鼎盛时期，当时索格底亚那、花刺子模、大宛均曾归其统治，其领土亦伸入今印度旁遮普、信德一带。并曾一度越过葱岭入侵于阗、莎车和疏勒。而汉本其故号，仍称其大月氏。

关于西汉和大月氏的交往记载不多。《拾遗记》曾记武帝太初二年（前103），“大月氏国贡双头鸡，四足一尾，鸣则俱鸣”^⑤，后武帝以为不祥，送还西域。近年在敦煌汉悬泉遗址出土大量汉代简牍，其中有一些涉

① 《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第3892—3893页。

② 《梁书》卷一八《康绚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90页。

③ 《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575页。

④ 《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第2921页。

⑤ 《拾遗记》卷五，第122页。

及西汉中后期与大月氏使者来往的情况。如简 V92DXT1411②: 35 载: “甘露二年三月丙午, 使主客郎中臣超, 承制诏侍御史曰□都内令霸副侯忠使送大月氏诸国客……”简 V92DXT1210③: 132, 记永光元年(前 43)四月, “使大月氏副右将军史柏圣忠将大月氏双靡翎侯使者万若山副使苏赣皆奉献言事……”简 I 91DXT 0309③: 97 载: “客大月氏、大宛、疏勒、于阗、莎车、渠勒、精绝、扞弥王使者十八人, 贵人□人。”① 可见西汉中后期大月氏和汉使者来往还是比较频繁的。

大月氏同中国的交往主要是在东汉时期。明帝永平十七年(74)班超复设西域都护, 平通汉道, 大月氏(贵霜)表示愿意归附汉朝, 并助讨龟兹。章帝建初九年(84), 疏勒王忠反叛, 并联合康居, 班超以大量锦帛赠贵霜王, “超乃使使多赍锦帛遗月氏王, 令晓示康居王”。在月氏王的斡旋下, 康居退兵, “执忠以归其国, 乌即城遂降于超”②。

章帝章和元年(87)匈奴立莎车王贤子不居征为莎车王, 不久又立其弟齐黎为莎车王。章和二年(88)西域长史班超遣诸国军, 并得到月氏的援军, 击破莎车, 使莎车归属于汉。后月氏因助汉击车师有功, 遣使向汉“贡奉珍宝、符拔、师子, 因求汉公主”。这一要求为班超所拒, 引起月氏怨恨。永元二年(90), “月氏遣其副王谢率将兵七万攻超, 超众少, 皆大恐”, 班超劝慰军士曰: “月氏兵虽多, 然数千里逾葱岭来, 非有运输, 何足忧邪? 但当收谷坚守, 彼饥穷自降, 不过数十日决矣。”果然谢既攻打班超不下, 又抄掠无所得, 只好派骑兵持金银珠玉去贿赂龟兹, 班超设兵伏击月氏兵, 尽杀之, 并“持其使首以示谢”, 于是谢惊服, 遣使请罪, 退兵, “月氏由是大震, 岁奉献”③。

东汉安帝元初年间(114—119), 疏勒王遣舅臣磐至月氏为质子, “月氏王亲爱之”, 后臣磐在月氏扶助下, 返国为王, 因而臣磐与月氏关系相当密切。汉顺帝时, 臣磐多次向汉贡物, 如阳嘉二年(133), “臣磐复献

① 张德芳:《悬泉汉简中若干西域史料考论》, 载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 新史料与新问题》, 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137—138 页。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133 页。

② 《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 第 1579 页。

③ 同上书, 第 1580 页。

师子、封牛”^①，所献之物大多来自大月氏等地。

1965年，西安西北汉代长安城内出土了一只陶罐，内有带铭文的铅饼共13枚，1973年，陕西省扶风县姜塬又出土了两枚这样的铅饼，夏鼐先生认为结合这个遗址中出土的其他文物来看，“其上限不会早于西汉晚期，下限不会晚于东汉晚期”^②。近来，我国学者林梅村认为，这些铜饼和铅饼上的铭文应当是用草体希腊文拼写的中古伊朗语。他指出公元1世纪前期，贵霜王朝建立，公元2世纪中叶以后，贵霜内乱不已，境内的大月氏人大量地流亡东方，进入东汉避难。我国出土的这些铭有草体希腊文的铜饼与铅饼，很可能就是流寓到中国的贵霜大月氏人在三辅（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中部地区）及其西邻地区频繁活动留下的遗物^③。

身毒：又称天竺，即今印度。当时“从月氏、高附国以西，南至西海，东至磐起国，皆身毒之地……其时皆属月氏……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④。中国与印度之间的民间商业往来至少在开通西域之前的汉朝初年就已经开始了。张骞在大夏所见经印度输入该地的蜀布、邛竹杖即可说明蜀地商人早已运蜀货至身毒，这些蜀货再通过身毒转销至大夏。由此可推测，可能在汉朝初年就存在一条从四川经云南到缅甸的贸易通道^⑤。张骞二次通西域后，曾分遣副使访问身毒，大概身毒也曾派使前来。此后，汉和身毒的贸易往来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斯坦因在汉代玉门关遗址的一处烽火台中发现一片带有婆罗谜（Brahmi）文字的丝绸残片，他认为该丝绸是在西汉末年由中国内地制造的^⑥。这是汉与身毒之间有丝绸贸易往来的一个明证。

东汉时期，汉和身毒之间有官方往来记载。汉和帝时期（89—105），

① 《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第2927页。

② 夏鼐：《外国字铭文的汉代（？）铜饼》，《西安汉城故址出土一批带铭文的铅饼》，《夏鼐文集》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11页。

③ 林梅村：《贵霜大月氏人流寓中国考》，《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33—67页。

④ 《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第2921页。

⑤ 余英时：《汉代贸易与扩张——汉胡经济关系研究》，邬文玲等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144页。

⑥ A. Stein, *Serindia*, 3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1, pp. 701—704.